

姚建华 主编



2 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
SERIES OF MEDIA AND DIGITAL LABOUR: WESTERN PERSPECTIVES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4 9 24
6 12 8 0 3
5 5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姚建华 主编



2 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

SERIES OF MEDIA AND DIGITAL LABOUR: WESTERN PERSPECTIVES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4 6 5 9 1 24 12 8 0 3 5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姚建华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 西方的视角丛书)

ISBN 978-7-100-14980-8

I. ①媒… II. ①姚… III. ①传播媒介-数字化-研究 IV. ①G219.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0207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姚建华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80-8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25

定价: 40.00 元

总 序

Vincent Mosco (文森特·莫斯科)

信息技术正在发生巨变,数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可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互联网。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了三个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和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Mosco, 2014; Greengard, 2015)。它们将数据存储和服务集中于众多的数字化工厂手中,用来处理海量的由网络传感器所收集的信息——这些传感器可能嵌置于消费者、生产部门和办公室的设备抑或活着的个体之中。这些改变带来了大量的挑战,尤其是对劳工来说,而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套聚焦于数字劳工的丛书如此之及时和至关重要的原因。

技术对于工作的影响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自动化而导致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引发了公众对此议题大规模的探讨(Wiener, 1948)。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正在创造,并可能持续创造出就业的机会,包括构建数据中心全球网络、数据科学中新的领域和对由互联网连接的物体控制、维持和监控过程中的传统建筑工作。然而,今天新的技术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抵消人类的劳动,尤其是专业知识劳动。事实上,一位资深的咨询师将云计算定义为“仅仅是你的信息技术运作过程外包的下一步”(McKendrick, 2013)。这与一位高德纳研究员简述的信息技术的大体趋势不谋而合,他说道:“信息技术长远的价值属性并不在于支持人力资源,而是取代它。”(Dignan, 2011a)数字技术正在创造出使得公司即刻就能将其信息技术运行过程合理化的机会。高德纳的研究员再一次强调:“首席信息官相信他们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桌面和商业应用软件总体来说是效率低下的,并需要在将来

的十年内对其不断调整,使之合理化。我们相信与这些无效率资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人员也会随着这个过程而大规模地被合理化。”(Dignan, 2011a)

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公司主张:数字技术的体系会打破商业组织模式,而这种打破随着第一台大型计算机进入工作场所就开始了。从那以后,所有的商业和政府机构坚持运营它们自己的信息技术部门,大公司坚持运营自己的数据中心。现在新体系的支持者认为,当许多大型的数据中心可以以更少的成本和专业人员来满足这些需要的时候,建造和运行这些数以千计、每个组织专门的设备就不再重要。这个过程早已经开始,先期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于信息技术部门有限地“瘦身”,公司仍可以削减其 15%—20% 的信息技术预算(Howlett, 2014)。

新技术同样使得对所有知识和创造性劳动普遍的合理化过程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不断地涉及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播。一位观察者发现:“在接下来的 40 年间,分析系统将取代今天知识劳工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Dignan, 2011b) 2013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美国几乎二分之一的劳工正在受到直接失业的威胁,处于失业的高风险范围之内(Frey and Osborne, 2013)。尽管机器和劳工在工作中的具体比例尚未得知,但当今借助软件用机器系统取代知识劳工工作的趋势不可抵挡。我们开始看到这些改变对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领域的影响。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正在被鼓励将其核心业务过程外的所有业务外包给诸如 Salesforce.com 等公司——它们专门从事管理客户信息庞大的数据,这项工作通常由公司内市场和客服部门负责。

不断外包给计算机的工作的增多对弹性生产的整个全球系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高德纳指出:“这一结果将对所有经济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现在正主导着技术外包。”(Dignan, 2011a) 新数字技术同样扩大了潜在的外包实践的范围。这可能是一句大话,但就像《福布斯杂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都是外包方”,且外包可能的形式不断多样化:“外包不再以百万美元大贸易为特征,在这些交易中信息技术部门的运作过程交由第三方负责。相反,许多小事情的点点滴滴渐渐地交由外部的实体负责。”(McKendrick, 2014) 数字技术的下一步革命已经改变了劳动的过程。瑞典电影业的工人将计算机芯片植入其皮肤之下,只需要隔天来办

公室上班,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对其管理的控制——这就是对此观点的明证(Cellan-Jones, 2015)。

正是因为这种对工作场所和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本质上重塑的可能性,这套由姚建华博士主编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的出版就显得格外“恰逢其时”。首先,建华是最合适在理论上迎接这些议题所带来挑战的学者,因为他对于数字劳工的西方研究视角有着广泛的涉猎且在加拿大接受过系统化的理论训练。他本人对于中国媒介工作者的研究展现了该领域研究者所必需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策略。此外,他在将西方视角应用到对当下中国知识劳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分析方面,具有良好能力(Yao, 2014)。

整套丛书分成四个具体的领域,完整地为学生提供了西方视角下数字劳工最前沿的研究。第一卷《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聚焦于数字劳工对于制造和服务业的影响。此卷从阶级、性别等一系列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出发,这些范畴对于描述西方社会劳工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导致的“数字鸿沟”及其程度十分有益,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妇女在工作场所所遭受由数字技术无规制的应用所带来的大量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在此基础上,第一卷审视了制造和服务业两个具体行业中的数字劳工,因为这两个行业中数字技术对工作转型和全面消除工作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二卷《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主要聚焦于西方媒介产业,在这里新的数字技术影响重大:在新闻、广播和广告等传统行业内工作数量减少和权力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当2016年8月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宣布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个公司的时候,这种发展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谷歌和脸书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且负责传播世界上大多数的新闻。然而,与诸如《纽约时报》在内的传统新闻业先行者不同的是,这些公司并不雇佣职业的新闻记者。它们仅仅依赖于用户发布自己的故事,然后向用户兜售广告,使得用户不得不尝试区分事实和虚构、真新闻和假新闻、信息和政治宣传。本卷揭示了媒介工作者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劳动和消费边界的不断模糊。第三卷《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Digital Labour: Prosumers and Playbours*)强调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过程。我们通常将生产者界定为生产产品的工人,而将消费者界定为使用这些产品的用户。但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与工人不同,因为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s)。同样的,公司也会让用户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我们可以使用“玩工”(playbour)这个术语对其予以界定。虽然这种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预见,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越来越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

本套丛书的最后一卷《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Labour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着眼于西方学术界对于数字劳工世界在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应对方法的研究。其主要聚焦于工人组织,包括工会合并的兴起或现存的基于某一行业的工会(如新闻业)扩张为包括广播在内的数字技术和协会组织联系起来的新的产业——其中,协会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来不断满足工人的需求和推动政治议事日程,进而将工人联合起来。

数字劳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对于许多学科而言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来说。本套聚焦于数字劳工的丛书为他们全面地了解西方视角下数字劳工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

(姚建华 译)

参考文献

- Cellan-Jones, Rory. (2015). "Office Puts Chips Under Staff's Skin." *BBC News*. January 29.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1042477>
- Dignan, Larry. (2011a). "Cloud Computing's Real Creative Destruction May Be the IT Workforce." *ZDNet*. October 24. <http://www.zdnet.com/article/cloud-computings-real-creative-destruction-may-be-the-it-workforce/>
- Dignan, Larry. (2011b). "Analytics in 40 Years: Machines Will Kick Human Managers to the

- Curb.” *ZDNet*. October 18. <http://www.zdnet.com/article/analytics-in-40-years-machines-will-kick-human-managers-to-the-curb/>
- Frey, Benedikt and Michael 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publications/view/1314>
- Greengard, Samule. (2015).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mbridge, MA: MIT.
- Howlett, Den. (2014). “Exclusive: Computer Economics Study—Cloud Saves 15 Percent,” *diginomica*. February 13. <http://diginomica.com/2014/02/13/exclusive-computer-economics-study-cloud-saves/>
- McKendrick, Joe. (2013). “In the Rush to Cloud Computing, Here’s One Question Not Enough People Are Asking,” *Forbes*, February 19.
- McKendrick, Joe. (2014). “We’re All Outsourcers Now, Thanks to Cloud,” *Forbes*. August 11.
- Mosco, Vincent. (2014). *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 Wiener, Norbert.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New York: Wiley.
- Yao, Jianhua. (2014).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资助

丛书顾问

童 兵(复旦大学)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加拿大女王大学)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

曹 晋(复旦大学)

马 凌(复旦大学)

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导 言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 1

第一章 媒介产业作为知识 / 创造性劳动者的数字劳工

1. 表达和剥夺：创造性劳工的“自主—控制”辩证法

乌苏拉·胡斯 / 13

2. 免费劳力的隐喻：媒介行业不同类型的无酬工作

卡琳·法斯特 亨里克·奥恩布林格 迈克尔·卡尔森 / 38

第二章 新闻业的数字劳工

3.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作家与剥削

尼科尔·科恩 / 63

4. 机器人记者：自动化新闻与劳工、写作形式和新闻权威的重新定义

马特·卡尔森 / 94

5. 英国和西班牙数字电视新闻编辑室中的新闻工作者：竞争环境下的工作流程和多重技能

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

比恩贝尼达·莱昂 凯伦·桑德斯 杰基·哈里森 / 117

6. “情理之中”过时的电视新闻业

杰拉尔德·瑟斯曼 凯里·希金斯-多布尼 / 142

第三章 其他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7. 数字时代的媒体学生工：教室和大学中的“新奥尔良传媒”

维奇·梅耶尔 乔斯林·霍纳 / 165

8. 全球动画产业的劳动力、问题及其应对机制：被边缘化的漫画创作者的苦痛

约翰·兰特 / 181

Contents

Introduction Richard Maxwell/1

I Digital Labour as Knowledge/Creative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1. Expression and Expropriation: The Dialectics of Autonomy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Ursula Huws/13
2.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 Karin Fast Henrik Örnebring Michael Karlsson/38

II Digital Labour in Journalism

3.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Nicole Cohen/63
4.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Compositional Forms,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att Carlson/94
5.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 Bienvenido León Karen Sanders Jackie Harrison/117
6.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Gerald Sussman Carey Higgins-Dobney/142

III Digital Labour in Other Media Industries

7. Student Media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NOLA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University Vicki Mayer Jocelyn Horner/165
8. The Global Cartooning Labour Force, Its Problems and Coping Mechanisms: The Travails of the Marginalised Cartoonist John Lent/181

导 言

Richard Maxwell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

20 世纪后期伊始,一般劳动过程发生着稳定、但却不均衡的转型,这种转型日益波及媒介工作者和媒介工作环境。随着 19 世纪的资本将更大范围内的劳动力吸纳到大工业生产的领域之中,越来越多的工人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独立技能和创造力正在不断失去价值,且被标准化为抽象的生产力——工人的身心被迫屈从于机械化的大生产,即不间断的商品生产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和模式的机器与技术不断被更新,而每一种更新都围绕着消除工作、用机器代替工人、创造新的劳动力形式等方式来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重构。当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在 20 世纪被引入劳动过程中时,“工厂和工地、办公室和实验室”中的劳动者往往受资本的直接影响而逐渐使用相同的工具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要求劳动者不断地掌握新的技能,而传统技能则被淘汰 (Schiller, 2016: 8-11)。席勒论述到,以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计算机技术不仅使一系列信息处理的“手工技能”(artisanal techniques)持续机械化,并将曾经无需劳动力的部分重新吸纳到工厂化的劳动过程之中;而且这些技术强制性地组织已经不断分工的劳动者重新进行集体的、网络化的活动,且以大工业的模式进行运作。

本卷《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收录的论文聚焦并分析了不同产业中劳动过程转型的具体实例,尤其是媒介产业。欧美学者在本卷提供的“西方视角”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不同的媒介部门如何应对数字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框架,随着全球劳动过程的加速网络化,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西方媒介产业

的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卷入全球信息技术供应链,这些信息技术产品的实体目前大部分由中国生产和制造,技术支持服务则由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

资本的力量已经通过全球的相互连接而深入到非西方世界的劳动力中。例如,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智能手机的工人的劳动速度和时间直接由来自这些国际品牌的美国或欧洲的总部决定(Harris, 2014)。将行政任务外包给亚洲或拉丁美洲劳动力的美国公司是另一个实例,这些劳动力不仅包括客服代表,他们主要帮助美国电子产品的消费者解决技术难题,而且还包括低薪的印度“网络水军”(click farm workers),他们被雇佣来秘密地提高社交媒体网站的活跃度和影响力(Clark, 2015)。

还有大量其他的例子与劳动过程的这种跨国性的趋同和融合有关(Maxwell, 2001)。其中大部分显现出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特质(Schiller, 1976):在传播的过程中,数字网络与企业组织(等级制、非民主化)和商业文化(市场标准、增长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不断构连。例如,智利的市场研究公司正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深度自动化工作,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员工因此将长期面临着其知识工作被算法所替代的残酷的事实(AmericaEconomía.com, 2017)。在巴西,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执行与全面质量管理软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oftware, TQM)和其他类型的客户关系软件的要求和预设脚本相匹配的任务。这两款软件都坚持要求工作人员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避免使用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人际和文化交流的技巧(Wolff, 2016)。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批判研究致力于追问: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地方和区域间的差异性如何改变、抵制和/或接受资本将劳动力不断吸纳到更大规模的、国际化的产业体系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除了数字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之外,他们通常需要经历和应对异化、剥削、机器人化和不稳定的工作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Schiller, 2014: 17-31)。

本卷旨在从对国际案例的比较研究出发,为读者更好地洞察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中的劳动力重构提供独到的见解。这种重构的过程与工作场所的文化紧密相关,而后者长期由数字技术所决定,本卷中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 Higgins-Dobney)、约翰·兰特(John Lent)等学者的论文都对此有所着墨。这种重构的过程同样建立在不稳定劳动力的形成之上,诚如尼科尔·科恩(Nicole Cohen)在她对自由作家细致的论证中所表明的那样。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等学者考察了“无酬劳动”(non-paid forms of labour)及其隐喻,并对剥削、统治、压迫、分享和自愿服务等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这种分类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读者思考媒介产业中创造价值的不同类型的“无酬劳工”(free labour)。维奇·梅耶尔(Vicki Mayer)和乔斯林·霍纳(Jocelyn Horner)通过以洛杉矶“新奥尔良传媒”(Media New Orleans Los Angeles, MediaNOLA)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如何为进入路易斯安那州区域性的媒介产业做好准备的过程。这种教育/就业维度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对即将在媒介产业工作的学生进行培训能够给大学在教学、科研和考核等方面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尚未经过实际的验证。

在劳动力和劳动过程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际,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或推波助澜、或限制阻碍的不同应对方案;通过比较研究来了解这些政策,有助于读者理解制度性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和地位。科恩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称为“文化工作的持续性特征”(endur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work)。它们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且对劳动过程进行再生产和规范化,使国家制度的运作服务于资本的要求。

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或国家的自身利益绝非是一蹴而就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内部张力已使其不稳定的本质基础昭然若揭。法国政治经济学的调节学派(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是理解这些“不稳定”理论的路径之一。该学派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也可以被称为“积累制度”(a regime of accumulation)。这个制度存在内生性的矛盾:在不断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同时,孕育出新的制度和新的行为模式(思想习惯)出现的条件和环境。这些新兴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充分融合后,形成了新的管制模式,演进为支撑积累制度的支柱。通过每一次周期性的危机或每一轮破坏,过度消费和生产力下降导致

新制度的产生,这些制度不仅使劳动力更好地为新的体系服务,而且在国内劳动力市场和横跨全球供应链的不同地区被不断地常规化(或规范化)(Boyer and Saillard, 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调节学派认为福特主义的管制模式逐渐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的管制模式。在后福特主义阶段,新的管制模式放松了政府干预,这使得金融资本的力量得以空前加强,并推动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政治和商业领袖通过改革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政策破坏了工会的政治权力,进而导致弹性雇佣合同的普遍化和兼职工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非技术劳动力数量的剧增(Harvey, 1989; Webster and Robins, 1986)。信息和传播技术促成了劳动过程的转型,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这些技术实现对跨国公司远程业务的管理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与后福特主义管制模式密切相关的是,新的数字主义在对劳动力进行赋权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资本对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NIDL)的控制。

从调节学派的观点出发,通过将资本的危机、创新和复苏的模式映射到文化领域,能够更好地发掘后福特主义积累制度的文化意涵。例如,20世纪后期,好莱坞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控制依靠劳工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反工会条例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对新的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劳动分工的支配(Miller et al., 2004)。在本卷中,兰特在考察全球漫画创作者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是如何抵制剥削和统治的历史的基础上,对这种权力结构进行了阐释和批判。

后福特主义时期出现了对文化价值观的攻击,后者是自由民主国家界定媒体社会功能的核心要件。对公共政策提出质疑的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追问的基本命题是:媒介组织和机构为什么要为公众服务,它们仅仅是信息、教育和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组织和机构吗?这种追问是对广播、电视和平面新闻中公共利益模式最为直接的攻击。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不断侵蚀公共服务部门,朝野普遍反对对具有反市场基本特征的公益事业实施保护。媒介组织和机构注意到,放弃公共利益模式,不再做调查性新闻,减少对政治和商业权力的监督,砍掉劳工和环境新闻等在内的严肃新闻形式,反而在经济上收益颇丰。诚如

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在本卷中指出的那样,公共服务理念的隐没造成了电视新闻的文化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倡导商品化的新闻业如日中天——它们往往通过娱乐、名人新闻、体育、天气预报和其他低成本的内容来增加受众的数量。

新技术和分销服务(特别是有线电视)在加速媒体向“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转型的同时,使新闻业的内部危机(至少在美国)不断恶化。在受新自由主义制度影响的管制模式下,新闻媒体因公共利益标准的丧失而变得脆弱不堪,同时进一步屈从于互联网平台,后者在商业广告收入的份额方面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互联网平台主要基于网络效应,有着大量受众数量和份额,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化和增长)(McChesney, 2008; Pickard, 2015)。

调节学派将资本主义视为最高级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同时着重分析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和组织机构(包括市场、交易、货币、监管机构、监狱、军队等)、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性质,以及这些矛盾可能引发的潜在的社会危机。调节学派是各种政治经济理论学派混合的产物,这些理论学派包括承认国家权力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强调新凯恩斯主义管制手段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关注劳工问题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以及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制度主义聚焦于系统的不稳定性、不平等、历史相对论、制度认同与国家官僚机构和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等(参见 Maxwell, 2001)。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后福特主义几个方面的实践被放大了。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国家机构开始向超级收费引擎转型,用以加速私人财富的积聚。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由“应得的所有者和懒惰的无产者”(deserving haves and slothful have-nots)组成的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她曾这样总结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新常态:“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在她看来,人们不需要社会关系,同样也不需要国家来确保共同体的生存(Moore, 2010)。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财富的不断积聚将使普罗大众受益;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国家对市场失灵进行纠偏。大量学者认识到这种立场背后错误的推理和政治机会主义的隐

喻,200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更加证明了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Piketty, 2013)。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即使不曾真正主导美国 and 欧洲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浸润的一代政治家们仍然在影响着公共决策的方方面面。

因此,政治经济学者尖锐且清晰地指出:不存在任何一种神奇的市场机制可以确保产生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公共财政支持的福利计划抑制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和“效率”的说法也是有失偏颇的,且遮蔽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非缩小的事实,同时旨在改善公众总体福祉或捍卫公共利益的政府项目因为这种观点被大幅缩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企业并未被课以重税,而是通过隐匿的制度安排将沉重的税赋从富人转嫁到穷人的身上。与此同时,大量的避税产业(有时也被称为“财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导致政府税收的严重不足,同时加剧了财富的“向上逆流效应”(trickle-up)。从这样的理论原点出发,纠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这种社会危害具体体现为经济学家所指代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如污染、工人健康和职业的风险等——这些“外部性”被认为是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法规避的代价(Quiggin, 2010)。

最后,苏联的解体和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危机助长了政府不能履践其社会责任观点的滋生。因为缺乏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公共事业的私有化被非常高效地推进,对核心民主制度的控制权被转移到强大的跨国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产业的手中(如保险、信息技术、公共关系等)。国家层面监督的另一个实际的缺陷在于:以对劳动进行算法的控制为核心的监控技术和规范监控的法律涉及不同的时空维度。在现阶段,随着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和即时性的跨边界数据流的不断发展,对监控机器的监管和管制的法律努力不是滞后的,就是错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公司(而非有限的政府和企业)能更好地利用存在于法律和技术之间的这种时空分离(spatiotemporal disjuncture)。这给国家组织和机构采用信息技术产品和实施其他劳动控制的制度平添了额外的压力,而这些皆普遍存在于综合性的、大型的产业模式之中(Maxwell, 1998)。

欧盟在联盟内对隐私的保护已经达成一致的标准,且至少在最近的法